



中苏论战与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Sino-Soviet Dispute and China's Socialist
Development

陈立中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12FDJ003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陈立中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 陈立中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073 - 4327 - 4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56~1965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829.512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010 号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著 者: 陈立中

责任编辑: 韩 冰

封面设计: 毛 淳 孙彦红

责任印制: 寇 炫 郑 刚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电子邮箱: zywx5073@126.com

销售热线: 010 - 63097018、66183303

邮 编: 10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25.5 印张 445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4327 - 4 定价: 5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选择：以俄为师	17
一、确立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	17
二、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23
三、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30
第二章 论战的缘起：什么是社会主义	44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阶段	44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64
三、社会主义发展的环境	79
第三章 论战的主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94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	95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	105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自主原则	116
第四章 论战中的经济建设：由“三面红旗”到经济调整	127
一、改进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127
二、高举“三面红旗”发展经济	138
三、国民经济的挫折和调整	161

第五章 论战中的政治建设：由反右派斗争到“反修防修”	184
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奠基	184
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210
三、党内外斗争性质的混淆	222
第六章 论战中的文化建设：由“双百”、“两用”到 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234
一、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	234
二、“双百”方针的制订和实施	246
三、文化的政治功能不断强化	263
第七章 论战后的新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78
一、“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278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286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307
第八章 弥足珍贵的启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22
一、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322
二、必须承认和尊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	335
三、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345
结 语	368
参考文献	370
后 记	399

前 言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前进。”^①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奋进，并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抚今追昔，我们深切体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以来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富强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这条中国发展道路又是多么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找到的新路，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强之路、共赢之路、创新之路，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开辟，绝不能割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不倦、前仆后继寻求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更不能割断“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而斗争的联系，其中也包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中苏论战影响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苏论战主要是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等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同时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之争。邓小平在 1989 年会见

^①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8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又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① 这场争论由 1956 年关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分歧引发，到 1966 年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断，史称“十年论战”。中苏论战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方面面，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对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在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都留有深深的烙印。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中苏论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伊始时就是这样一种既定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等客观存在，都是不可选的、既定的甚至是特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在中苏论战等特定条件下进行的，研究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1、294 ~ 29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5 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时当然不应回避中苏论战的影响。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归结为亦步亦趋地仿效“苏联模式”，从而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民族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关系，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发展时期，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从历史实践或理论逻辑上说都不应该也不能割断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胜利、建立新中国和恢复国民经济后，又及时率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推进无疑具有深远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尽管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出现严重挫折和错误，但是成就仍然巨大而且卓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独创性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经验教训。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就“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立并不断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体现了“一化三改”即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的中国特点。对于具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167页。

独立自主传统作风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即使完成“一五计划”时“照抄”了苏联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但是仍然保持有“大集中小分散、大统一小自由”的中国特色。随后，又根据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经验，提出和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既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又确立了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原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其中包括中国正在并且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关于探讨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总方针和总目标，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统筹兼顾”等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两个务必”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保证措施，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六条标准”和“两用原则”。当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情，需要在实践中边探索、边总结、边提高，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正如毛泽东在1961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1963年他又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①探索中出现失误总是难免的，但是可以“吃一堑长一智”，而且“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改革开放前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痛苦经验”中进行“痛苦的学习”，对于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或许会更有参考价值。

“模式”（Mode），原指制造器物的模型，后被引申为“事物的标准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样式”或“范型”，一般指事物制作或发展的范本、模本。当“模式”被用来描述社会生活与组织形式时，则是指一定政府代表统治阶级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所提倡的理念、组建的体制和采取的方针政策等范式。在不同时空、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下，模式具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 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当中，特殊性通过普遍性表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原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具有普遍规律，但这些规律不会表现为“纯粹的一般”，而是寓于各种特殊之中。所以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时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都各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如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美英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莱茵模式”、以社会福利为主要支撑来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制度的“瑞典模式”、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为主要内容的“拉美模式”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展普遍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制度框架、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赵曜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史中，杜林最早提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存在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世界模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应适应这些原则，遵循这个‘世界模式’，在他看来是先有思想、原则，后有物质世界。显然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世界模式”，但却“由于恩格斯的这一批判，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慎用甚至忌讳‘模式’一词。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模式一词，其中包括革命模式和发展模式。1953年4月斯大林逝世，情况发生变化。就在这一年，英国研究苏东问题的学者休·塞顿—沃森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92页。

所发表的《从列宁到马林科夫》一书导言中，首次提出了苏联模式一词，之后经过一番不同意见的争论，认识逐渐趋于一致，不仅西方学者，而且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接受和使用，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新概念。”^①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虽然可以多样化，但是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制度等。金雁教授在翻检有关资料时发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可以有不同模式的是布哈林。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提出：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产阶级不能成为成熟的社会组织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探索过程，所以“不同的国家中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共产国际公报》1922年第14~15号，第8页）”^②。社会主义既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那么现在关于“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中国模式”的说法，就有历史与理论的依据了。

“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一些学者的论述中，至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广泛采用。尽管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仍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莫衷一是，但一般都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建立的一整套制度、体制、机制等，萌芽于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熟。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高度集权：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以及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苏共中央成为凌驾于一切权力机关之上的决策机构，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是任命制和职务终身制，党内的民主都少于集中；思想文化和科学教育上，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实行统制与管理，

① 赵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思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② 金雁：《谁最先提出“社会主义模式”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规律。这个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创造了许多奇迹，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起过较好的示范作用，而且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民主政治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斯大林模式日益暴露出其缺乏生机活力的弊端，甚至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模式实际上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当然包括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到苏联解体以前的经验。但是，由于作为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形成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并被概括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以人们往往把苏联模式看成是斯大林模式。实际上，“苏联模式”与“斯大林模式”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管理制度、体制、机制等一整套体系，苏联模式则是指苏联共产党在整个执政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借鉴的是斯大林模式，而非列宁时期的苏联模式，更不是在斯大林之后经过改革的苏联建设模式。^① 本著作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所提到的苏联模式，主要是指斯大林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主要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言的，所以又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实现“一五计划”过程中，中共日益觉察到从苏联“照抄”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局限性，所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及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为鉴”和实现“第二次结合”，主题就是找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中共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虽然这种探索没能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但为后来的成功探索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理论储备。经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重新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

^① 彭成刚：《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历史考察》，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 we 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俞可平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实质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战略选择，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③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简言之，就是在“结合”中开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创新，在“后发”中赶超。^④ 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一种积极应对与融入全球化浪潮，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科学发展为价值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皈依，以发扬民族传统特色又开拓现代风尚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绝非一时半刻之功，形成过程中自然有许多借鉴、学习与探索之处，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探索之初的影响最大最明显，而中苏论战刚好发生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初期，理所当然成了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③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北京日报》2008年11月19日。

④ 袁新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析论》，载《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9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9年，第229页。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中苏关系历史档案材料的开放, 学术理论界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愈来愈深刻, 研究领域也愈来愈宽广。中苏论战成为国内外史学界、政治学界和外交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内学者也突破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造成中苏关系逆转根源的传统观点, 在中苏论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关于中苏论战的整体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中苏论战直接参与者的回忆录和一些学者收集的材料与文献汇编中,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苏论战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著作主要包括: 权延赤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晓的《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吴冷西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罗时叙的《由蜜月到反目: 苏联专家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 蒲国良的《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 1956~1965 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曲星的《中国外交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李丹慧编的《北京与莫斯科: 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 等等。其中, 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 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客观而详尽地叙述了中苏两党论战的来龙去脉及其基本内容, 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他著作也对某些具体事件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和记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国良教授、河南信阳学院马列所(现在江西宜春学院)李明斌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孔寒冰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宝训教授、浙江湖州师范学院虞文清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博士、中国科技大学社科部潘正祥博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邢

和明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叶政博士等学者，将中苏论战研究全方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开始从不同角度考察这个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关于中苏论战发生的原因，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观点很多，可以说众说纷纭，但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历史的积怨、对外战略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冲突、领导人之间的好恶等。相关的著作有：朱瑞真的《中苏分裂的根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左凤荣的《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蒲国良的《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沈志华、李丹慧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高飞的《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1949~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等。论文主要有：李捷的《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潘正祥的《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孙其明的《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林蕴晖的《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李明斌的《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何一成的《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对中苏论战的一些新剖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何一成、黄爱英的《再论中苏论战的历史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宁玲玲的《中苏决裂的制度因素分析》（《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熊光清的《近年来中国学者关于中苏论战起因的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沈志华、李丹慧的《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叶政的《中苏论战的成因再探》（《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12期）等。

关于中苏论战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这场论战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一个是在党和国家

关系上反对“老子党”的问题。在后一问题上，我们总的来说是对的，而在前一问题上，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不能因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并最终回到资本主义，就完全肯定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也有学者认为，对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充分肯定，在论战中，中共提出的许多论点虽然有些不足，但总的来说，我们反对了现代修正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 1998 年版）；孔寒冰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年版）；李明斌的《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等。论文主要有：薛钰的《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潘正祥的《中苏从同盟到对抗的经验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 年第 4 期）；刘克明的《中苏关系 40 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 1 期）；孙其明的《中苏论战与中国政治》（《同济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舒新的《评析中苏两党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争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也有文章主要从消极方面分析和阐述论战，如尹成的《关于 60 年代中苏论战的探讨》（《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 年第 3 期）；虞文清的《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李明斌的《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与启示》（《中州学刊》2011 年第 4 期）等。

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过去他们主要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的《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О. Б. Рахманин）连续写了两部关于苏中关系的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现在，这些学者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从客